

唐明生 ■ 著

思辨对话

超越

大银幕

Sibian Duihua

Chaoyue Dayinmu

上海三联书店

J992
T256

思辨对话

超越大银幕

唐明生 ■ 著

Sibian Duihua

Chaoyue Dayinmu

Duihua

Chaoyue Dayinmu

Chaoyue Dayinmu

J992

T256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思辨对话:超越大银幕 / 唐明生著.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05. 6
ISBN 7-5426-2060-6

I. 思... II. 唐... III. 电影事业—研究—中国
IV. J9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21401 号

超 越 大 银 幕

著 者/唐明生

责任编辑/朱慧君

特约编辑/徐 英

装帧设计/鲁继德

监 制/林信忠

责任校对/张大伟

出版发行/上海三联书店

(200031) 中国上海市乌鲁木齐南路 396 弄 10 号

<http://www.sanlian.com>

E-mail: shsanlian@yahoo.com.cn

印 刷/上海惠顿实业公司印刷

版 次/2005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200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890×1240 1/32

字 数/150 千字

印 张/7.5

印 数/1—5000

ISBN7-5426-2060-6/G·712

定价:16.00 元

对话嘉宾名单（以姓氏笔画排列）

王人殷	方玉强	邵牧君	陆寿钧
吴思远	陈思和	陈犀禾	贺子壮
张建亚	杨 扬	郝 建	赵建中
赵葆华	唐季礼	徐俊西	谢 飞
黄亚洲			

自序

在中国电影百年华诞即将到来之际，编辑一本有关中国电影的书，是件有意义的事。本书的书名之所以定名为《思辨对话：超越大银幕》，主要基于以下两点考虑：

其一，所谓“思辨对话”，即指这是一本话题性对话评论集，且对话内容带有思辨色彩。其二，所谓“超越大银幕”，又包含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这是其中一篇对话的话题，小说、散文与理论文章结集成书，常有用某篇篇名作书名的，本书因此也东施效颦；二是各话题所谈内容已“超越”对电影（银幕）本身的评判，扩大到创作、生产、分级、发行、院线和参与世界性竞争的大电影范畴。

综合上述两方面考虑，这本集子中的各篇对话，目的是为探讨繁荣中国电影的出路与对策。

众所周知，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国产电影每况愈下，若以票房来检测，则是观众锐减，票房大跌，亏多赢少，相当一部分影片血本无归。电影人为此惊呼：电影越来越难拍了。而自九十年代中期起，每年引进十部进口大片，几乎是“片片风光”，“狼来了”的呼声于是不绝于耳，尤其是面临加入WTO，人们更担心中国电影会溃不成军！

真实的情况也确实使人无法乐观。仅以1999年为例，为庆祝建国50周年，这一年国产电影的创作与生产出现一个高潮，全年共拍摄故事片102部，题材、风格和样式均丰富多彩。但令人不解的是，这一年的票房照样一路下滑，竟滑到了历史最低

点。后来新华社播出一条电讯稿，称1999年的全国电影观众仅4.8亿人次，按当时人口总数约12亿算，年人均看0.5次电影都不到，是建国以来观众人数最少的一年。

从此，“年人均看0.5次电影”便被作为国产电影处境严峻的典型量化指标。

原因何在？是好莱坞大片大举入侵和娱乐多元化分流了观众，还是产业化进程的脚步太慢？抑或兼而有之，患了综合之症？这引起了电影人的深思，大家为国产电影的境况感到忧虑，也为如何摆脱困境而开药方，找出路，并在不断推进改革的前提下，坚持走产业化发展之路。

其时，笔者正在主编一本大型综合性文学刊物《电视·电影·文学》，作为半个电影圈中人，笔者觉得刊物不仅要发表优秀的电影剧本，更要介入电影界的各种相关活动，为有识之士提供发表意见的阵地。若能因此对中国电影重新崛起做些促进之事，当是刊物和笔者的应尽职责。

决心就这么下了，但具体怎么介入尚待斟酌，关键是要找一个理想而有效的介入方法。

苦思冥想之际，忽然想到刊物曾经设立过一个话题性对话栏目“圆桌乱弹”，每期一个话题，选几位嘉宾，围圈而坐，自由地“乱弹”一气。当时，上海提出了“一流城市要有一流文化”的奋斗目标，因而所选话题多侧重“文化”方面，“圆桌乱弹”开了两年，累计12篇对话，先后被十余家报纸、刊物报道或转摘三十余次。其中好几篇对话同时被五六家报纸、刊物报道或转摘。反响之热烈，读者之欢迎，出乎意料之外。后来这12篇对话结集成书，书名就叫《圆桌乱弹：文化的多边对话》。

既然如此，介入的方法干脆移植（改造）“圆桌乱弹”的做法：形式还是“对话”，比较自由活跃；嘉宾由多人改为一人，“多边”变成“单边”，力求有思辨色彩；话题则从广义的文化转向单一的电影，而且要渗透到电影的方方面面。末了，话题谈

完再集结出书。

于是,自2000年初第一篇对话正式登场,至2003年底最后一篇对话收尾,历时四载,得17篇对话。这四年是国产电影最为困难的四年,也是电影人奋起努力的四年,17篇对话恰好从一个侧面记录了国产电影历经的曲折过程和电影人顽强拼搏的脚步。

所有这些话题,均根据当时国产电影创作与生产诸方面的实际情况提炼而来,参与对话的嘉宾,或是学者教授,或是剧作家评论家,或是著名导演,各自对所谈话题无不有相当研究,并能深入浅出,摆观点谈看法,做到既有思辨的理性色彩,又有翔实的数据事例,读来不枯燥乏味,具有极强的针对性和现实性。

17篇对话,10篇曾公开发表过,7篇是后补的。已发表的10篇对话,大都产生过较好的反响,有半数以上或被报纸改成新闻加以报道,或被收入权威的《中国电影年鉴》,或在全国文艺评奖中获奖。后补的7篇对话,办刊的友人获知,又索取其中一篇给予发表。这说明,关心中国电影的人并不少,作为文艺评论的一种形式,话题性对话已被公认,且受到欢迎。因此,作为对话的主持人,笔者感到极为欣慰与高兴。

由于不断解放思想,锐意改革,特别是2003年高层电影管理部门出台了一系列新政策,降低了非公有资本进入制片业、发行业 and 放映业的门槛,国产电影出现了令人欣喜的良好转机,及至2004年便捷报频传:全年拍片224部,三部大片的票房超过亿元,风头胜过进口大片,总票房达到15亿元。多少年了,中国电影终于开始走出低谷,为中国电影第二个一百年的到来开了个好头。因此,从这一点看,这本集子中的不少对话所涉及的问题已经解决或正在解决之中,似没有必要再旧事重提。但再往深里一想,却又并不尽然。一则成为历史的旧事是不应该被遗忘的,回想曾经走过的路,对今天怎样做到稳步前行是有好处的;二则,不断向产业化方向迈进的中国电影,路还很长,

许多问题看似已经解决，其实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况且旧问题还会以新的形式出现。

为将这 17 篇对话结集出书，在再次审读编辑过程中，除对有明显错误的文字、标点略作纠正外，其余一概不动，为的是尽量保持成稿时的原貌。此外，考虑到阅读时的醒目顺畅，有几篇对话的分节序号改用新起的“小标题”代替；一篇“关于文艺评论缺位的思考”和另一篇“关于古代题材电视剧泛滥的思考”，虽也涵盖了电影，但因不是直接从电影角度切入的，所以移为本书最后两篇，在此谨向徐俊西和杨扬两位先生致以特别的歉意。

最后，笔者真诚地感谢中国电影制片人协会，感谢每一位参与对话的嘉宾，若没有他们的大力支持，就不会有这本书的问世。

毋庸置疑，在未来的一百年中，中国电影必然会以其特有的风采屹立于世界电影之林！

唐明生

2005 年元月 12 日子夜

目 录

危机·冲击·未来	1
超越大银幕	17
要有一颗敢于抗衡的心	33
目标：打进国际市场	49
创作和市场之“手”	61
开创中国电影的新形态	75
重要的是要好看	89
谷底之后是希望	105
切莫忽略文化视点	117
“七怪”遮蔽了未来	129
前提：必须先商业化	143
多元投资的发展之路	159
不能再迟疑了	171
机遇·挑战·竞争	183
院线制：一条必由之路	193
市场、创作与文艺批评	205
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219

危机·冲击·未来

——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电影怎么拍？

唐明生：一切有过的辉煌与曲折都已过去，当迈进新世纪的开端之际，二十世纪毕竟成为了历史，要紧的是面向未来。

陆寿钧：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电影要以低成本、小制作为主，所拍的影片思想上要健康，题材上要接近大众，艺术上情节与人物要相对集中，感情张力要大。总之，要有可看性。

对话嘉宾简介：陆寿钧，男，一级编剧，著名剧作家，上海首届德艺双馨文艺家。曾任上海电影制片厂艺委会委员、创作策划部主任。独立及与人合作创作了《烛光里的微笑》、《一号机密》等十余部影视剧，并获多项国家级大奖，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唐明生 刚刚进入新世纪,就谈什么中国电影的危机,颇不合时宜。然而,只要稍稍熟悉中国电影现状的人,便不会感到突兀。试想,每年百余部新片,能让人记得住、叫得出名的佳作不过10来部。若以票房检测,则是观众锐减,票房大跌,亏多赢少,相当一部分还血本无归。据媒体报道,1999年的全国电影票房收入比上年减少近一半。电影人为此惊呼:电影越来越难拍了!观众的评价更为苛刻:中国什么最难看?答案是足球与电影。此话虽有调侃的况味,但也不失为是一种“民意”的反映。

说中国足球“难看”,否认的人不多。总说要冲出亚洲,踢进世界杯,结果呢?从兵败吉隆坡到败阵麦纳麦,跨时17年,无一次不刺伤中国人的心(尤其是球迷的心)。更使人看不懂的是,年年甲A开战,自己人“窝里斗”,拼命加玩命,直弄得头破血流;临到与外国人对仗,又全成了“软脚蟹”。有人笑言:让“国脚”射的球门,最好宽度与高度增加一倍。与此相反,本事不大,一个个拿钱却从不手软。走下绿茵场,连长年坐冷板凳的球员照样财大气粗,玩汽车、泡酒吧、找小姐,活得分外潇洒。传媒关于“国脚们”大赛前的“花边新闻”时有披露。咳,中国足球真他妈……

把国产电影与足球同列“难看”之列,显见国产电影在观众心目中的地位。由此说中国电影面临危机,也就不属危言耸听了。

还有一点不容忽视,中美关于中国加入WTO的谈判,历经13年马拉松拉锯战,世纪末终于签约。一旦中国正式成为世贸组织的一员,国产电影必将遭遇海外大片的冲击。仅好莱坞,初始阶段每年就有20部大片挺进中国电影市场(上海每年另加6部)。狼来了,中国电影怎么办?

对于发达的好莱坞电影雄霸世界,很多国家纷纷采取有力措施来抵制和防卫其文化的入侵。法国明文限定好莱坞影片进

口的数量和质量，为提倡和带动民众对本土电影的保护意识，总统密特朗曾特意做出表率，亲自进电影院看本国电影。毋庸置疑，入关后的中国政府同样会采取切实措施保护民族文化。问题在于中国电影本身要争气，要以相当数量的高质量的佳作与好莱坞片相抗衡，惟有如此，才能争得观众，赢得票房。说白了，中国电影不能等死！狼来了不可怕，要紧的是我们要拿起武器。在自身危机与外来冲击的双重逼迫之下，及时探讨 21 世纪中国电影怎么拍，极具现实意义。

六张“药方”——中国电影努力走进市场

陆寿钧 去年年底，确有记者问我：二十一世纪中国电影将怎么拍？我理解隐藏于提问背后的真正涵义——对中国电影的现状不太满意。作为电影圈内人，我深为上世纪末中国电影的境况忧虑。世纪更迭，千年跨越，许多人寄厚望于二十一世纪，盼中国电影尽快繁荣起来。

你刚才谈到，不少人把中国电影与足球相提并论，列入“难看”的范畴。我也听到过类似议论。但与足球相比，中国的电影还是有不少亮色的。至少，在上个世纪里，它在国际上还拿过几个奖！当然，我也理解影迷们的心情。中国有句俗话，叫恨之愈深爱之愈切。说中国的电影与足球最难看，本质上观众是希望中国的足球与电影能与我们的国力相适应，在国际上确立应有的影响和地位。

这里不妨作一番历史回顾。在上世纪的最后 20 年中，各路热心人为中国电影与足球开过多张“药方”。据我所知，围绕国产电影的振兴，先后曾有过 6 张“药方”。第一张是争取社会资助，主要是寻求大企业的支持，落实拍片资金。第二张是改革发行体制，从单一的发行公司垄断发行变为多渠道、多方式发行，让拍出的新片能争取更多观众，让制片厂能直接从发行中获得

更多的收益,以利于电影创作的再生产。第三张是影视合流,允许电影厂拍电视剧,再用拍电视剧赢利的钱支持拍电影,为电影生产注入活力。第四张是大投入大回收,一个时期拍巨片的呼声甚嚣尘上,据说这是学习西方的经验。第五张是引入高科技,采用电脑制作,片子会精彩好看,能吸引人,有人认为这是在电影的夕阳中看到了黎明。最后一张是政府扶持,即各级政府贴钱拍电影。先不说这6张“药方”的利弊得失,仅就这些“药方”本身而言,着眼点是在困境中谋求发展,态度是积极的。以影视合流为例,全国的数字我说不出,光上海一地,每年有1000万元拍电视剧的赢利用于投资了电影。很难想象,若是少了这1000万元,上海的电影还怎么拍?可惜的是我们没能进入良性循环。

唐明生 你说的这6张“药方”,时间上大概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因为此前的一段时期——从粉碎“四人帮”到八十年代中期,通常被称作新时期的10年。这10年,文学、戏剧、电影、电视等各个文艺门类,无不处在快速发展阶段。至今谈起这一时期的情形,人们流露出的是无尽的感慨与怀念。

还是以电影为例,发端于思想解放和实践检验真理标准背景下的新时期10年电影,政治上批判封建主义,艺术上批判工具论;而稍后的对外开放,又使电影创作与海外电影交流,于是佳作迭出,不仅在国内艺术界风光占尽,同时在国际各大电影节也屡屡捧杯得奖。《天云山传奇》、《西安事变》、《本命年》、《城南旧事》、《老井》、《黑炮事件》、《黄土地》、《红高粱》、《盗马贼》……说起那个时期的国产电影精品,片名可以排出一长串;谢晋、谢飞、吴贻弓、黄健中、吴天明、陈凯歌、张艺谋、黄建新……崛起的著名导演名字同样可以开出一长串。用春风得意形容那时电影创作的盛况与电影人的心态,毫不为过。无奈好景不长。

自进入八十年代中期起,国产电影开始下滑,且逐年为甚。

究其原委,客观原因大家能够理解。如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的倡导,使国产电影处于多种媒体夹击(尤其是电视)与两种体制转换的复杂格局中,因而失去了曾经有过的单纯艺术激情,也失去了独霸大众业余娱乐时间的地位。可在新时期之后的那么长时间内,又开了那么多“药方”,说不清为什么难见成效。

陆寿钧 世间没有包医百病的“药方”,国产电影逐年低迷,因素很多。对6张“药方”到底如何评估,可以反思。我个人的看法是,其中涉及两方面问题。第一,每张“药方”都利、弊并存;第二,如何使用每张“药方”,大有讲究。譬如搞大制作或叫拍巨片,九十年代中期方方面面叫得很凶。大背景是国内每年引进了10部海外大片,其中主要是美国片,观众反映强烈,票房连创历史新高。于是,只有高投入才会有高回报,拍大片能把散失的观众重新拉回电影院的呼声几成“共识”。这种看法有合理的成分。与一二百万元的小投资相比,高投入的影片在题材选择、制作手段及可看性上更具有诱惑力,对刺激低迷的市场有作用。也因为如此,在临近世纪末的四五年中,动辄投资六七百万元甚至上千万元的国产大片为数不少。《红色恋人》、《鸦片战争》、《红河谷》、《燃烧的港湾》、《海之魂》与《荆轲刺秦王》等影片还在拍摄阶段就被大肆宣传。无奈高投入并没能带来高回报,不少片子亏损很惨。

为什么?

我的看法有这么几条。第一,国外市场打不开。一部高投资的影片光靠国内放映无法保证不亏,要赢利必须保证有国外市场。西方也是如此。好莱坞的许多片子是通过全球性发行才赢利的。由于题材、观念、制度等方面的差异,加上经验上的缺乏,中国大片在海外市场作商业性放映,想取得较好的票房效益很难。第二,片子本身质量存在问题,不足以吊起观众欣赏口味。另外,从国内市场开辟的现状看,它的票房收入还是有一定限度的,超越了这个限度的投资,当然难以回收。在大片投入上,

有些制片厂实行“鸵鸟政策”——只讲票房多少,而影片回收却是个虚数。1000万元的票房,属制片方的至多为三分之一。所以,一些大片公开上映,尽管媒体炒得很热,每天报道票房多少多少,临到私下里一算账,还是亏了。还有,国外的大片票房的收入往往只是整个收入的三分之一,其他三分之二是靠衍生产业,而我们却吊死在票房一棵树上。

再譬如政府资助,本意是为了扶持重点影片的生产。我们完全可以大声说,世上没有第二个国家的政府像中国那样,对本国的电影生产给予那么多的关注。一些重点题材的影片,各级政府(包括相关机构),常常一给就是几百万元。这虽是好事,但从总体上看也存在负面效应。虽然部分影片因为有了政府资助,取得了社会与经济两个效益的同步跃进,但依赖国家的心态也同时萌生,且久难消除。有些制片厂一听说本厂筹拍的片子被列入“重点”,随即狮子大开口地虚报成本,名义上厂里出几百万,要政府支持几百万,实际上自己的钱一分不出,全靠政府给的资助拍片子。

更有甚者,对政府资助的那部分也要硬卡出一点,用于贴补开支。这样,政府资助成为变相的“扶贫”。长此以往,成了无底洞,那怎么行?应该说,6张“药方”都有一定的价值,关键是“临门一脚”还得由电影人去踢!好在电影人在实施这些“药方”时已或多或少地取得了经验和教训:任何把某一张“药方”推向极端的做法,或者一张“药方”不灵换另一张,造成恶性循环的做法,是不可取的。

唐明生 能否这样理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电影正在探索一条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新路子,其间有痛苦,也有曲折;而一张张“药方”的开出,恰好表明了这一探索的全过程。假如此说能够成立,那么整体评价历经多年探索后中国电影的现状应慎重斟酌。

此外,我还看到一篇关于1999年中国电影市场行情的分析

文章。文中谈到,1999年中国电影票房比上一年大幅度下降,某些省市下降率高达百分之六十。接着,在分析具体原因时讲了五条:一是宏观经济紧缩带来的严重消费不足,使电影外部环境恶化;二是特殊年代给电影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带来挑战;三是盗版光盘、走私影片泛滥;四是影片观赏价值不高,形成消费新一轮危机;五是进口影片停映是市场下滑的意外因素。五点原因,除第四点涉及主观方面外,其余四点均属客观原因。这有点讲不过去,因为属于中国电影生产自身的问题在分析中被遮盖了。你刚才也谈到,每一张“药方”都有一定的价值,关键在电影人的“临门一脚”。踢足球“临门一脚”不行,责任在踢的人;对于国产电影票房的连年滑坡,电影人似乎也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

陆寿钧 中国电影从指令性生产到面向市场而生产,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多年的改革实践,从总体上评估,电影人的心态开始趋向平稳,承受力越来越强,或者说慢慢成熟起来,躺在国家身上要饭吃的观念逐步淡化,面对严峻的市场,制片厂怎么办?摄制组怎么办?单个电影人该怎么办?大家的思考变得比较现实。与此同时,诸多“药方”在实践中已衍生出制约措施,电影生产与发行体制的改革也在不断深化,由此出现了一些令人兴奋的现象。举两个例子,以资证明。

其一,去年在沈阳举行的金鸡百花电影节上,我碰到一位老朋友——长影厂一位副厂长,他与我谈起在短期内扭亏并在电影摄制这个主体上略有盈余的经验时,谈到了关于面向市场的问题。他说,有些事是不能说也不能做的,那就是坚决要与党中央保持一致,绝对不拍思想内容不健康的影片;有些事可以说,但做起来要特别谨慎,那就是对大投入的制作必须同时考虑产出,电影已经十分虚弱,再也蚀不起大本;有些事少说多做,那就是把主要精力投入到赢利的影片上来,埋头苦干,把这些影片运作好。显然,在面向市场的实践中,长影人的头脑是清醒的,也是负责的。